

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思考

俞吾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费尔巴哈是否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德国古典哲学是否由“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样单线索的发展方式构成?德国古典哲学究竟有哪些遗产?等等问题,本文都做出了明确的解答。

关键词 德国古典哲学;费尔巴哈;复杂性;遗产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志码 A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它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17世纪形而上学和18世纪启蒙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吸纳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精华,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深邃、结构严谨、内涵丰富的哲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一批思想大师也在德国哲学界应运而生,正如德国诗人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所说的:“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1]305}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也为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向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20世纪以来的重要哲学思潮,如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无不受到德国古典哲学所蕴含的问题意识的深刻影响。

然而,对西方哲学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哲学界却缺乏相应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已经出版了一些以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译介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的研究作品,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或是囿于传统的见解,无法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做出全面的、合理的说明,或是缺乏当代意识,未能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意义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具体地说来,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研

究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

在传统的哲学史教科书和研究性著作中,人们通常把德国古典哲学理解为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运动。比如,俄罗斯学者A·B·古留加在《德国古典哲学新论》一书中认为:“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费尔巴哈(1804—1872)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代表,它的光荣的完成,它的坚决的改革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1]显然,把费尔巴哈视为“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代表”并不是古留加的观点,而是列宁的观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1913)中叙述马克思主义时,列宁曾经指出:“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2]310}尽管列宁在这段话中没有列出属于“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全部哲学家,但他似乎倾向于肯定,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显然,列宁的这一见解对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列宁的见解能否作为一个定论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人所共知,“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概念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诚然,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作为一个专门的论题加以讨论,但他实际上已经以自己的方

式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法的三大形态时指出:“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研究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3]287-288}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②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运动,而黑格尔则是这一运动的完成者。显然,按照恩格斯的见解,这一运动并没有把费尔巴哈包含在内。

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非常明确地叙述过自己对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看法,为什么列宁仍然把费尔巴哈也放进去呢?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然辩证法》作为手稿,于1925年才第一次全文刊登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上,列宁生前并没有读到这份手稿。当然,毫无疑问,列宁读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但由于该书并没有明确地界定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加上恩格斯又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这就很容易产生下面这样的误解,即把费尔巴哈理解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名成员。

至于中国理论界,之所以迄今仍然处于这样的误解之中,或许还有书名翻译上的原因。众所周知,恩格斯原著的书名是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翻译 *Ausgang* 这个德文名词。其实, *Ausgang* 乃是动词 *ausgehen* 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化,而 *ausgehen* 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含义是“外出”或“出门”。所以, *Ausgang* 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含义也应该是“出口”、“出路”或“出门”,但也有“终结”、“终局”的含义在内,因而单从字面上分析,似乎人们把上述书名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无可厚非。

然而,当我们超出单纯字面的含义,从恩格斯当时写作的特定语境中来考量 *Ausgang* 的含义时,就会发现,上述书名中的 *Ausgang* 只能译为“出路”,而不能译为“终结”。为什么?因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的

译法极易产生如下的错觉,仿佛费尔巴哈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而终结者自然是隶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内的。事实上,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费尔巴哈看作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在他看来,终结者的角色只能由黑格尔来担任,所以他这样写道:“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3]220} 假如我们打算撰写另一部著作——《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个书名倒是十分贴切的,因为黑格尔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

因此,我们认为,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应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只是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被终结后出现的一条新出路或一个新出口。作为“出路”,费尔巴哈哲学已经置身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外了。打个比方,如果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城堡”,那么费尔巴哈已经“走出了”城堡。有人也许会反驳道:既然是“走出了”城堡,不是正好说明费尔巴哈原来在城堡之内,即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内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当费尔巴哈还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时,他的哲学是从属于黑格尔的。在这个意义上,把他归入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内,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范围内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然而,一旦费尔巴哈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也就“走出了”城堡,不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了。所以,无论如何,在恩格斯当时的语境中,作为独立思想家的费尔巴哈并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这就启示我们, *Ausgang* 这个德文名词的翻译不仅涉及到字面上的含义和翻译的技巧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对恩格斯思想的理解问题,因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关系上的新见解是:成熟时期的费尔巴哈哲学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青年时期的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哲学可以作为黑格尔哲学的附庸而归入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之内。

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复杂性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性”是相对于“简单化”而言的。不少西方哲学史方面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理解为“康

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一单线索的发展进程。显然,这样的理解方式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简单化、扭曲化了。按照这样的理解方式,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17、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常常是无神论者,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则通常显现出深刻的宗教背景?为什么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会形成著名的“同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identity)?为什么在从费希特哲学向谢林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出现了从主观化倾向向客观化倾向的转变?为什么在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身上,体现出批判启蒙思潮的深刻的反省意识?为什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理性(经线)和情欲(纬线)交织的结果?为什么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时间框架内会出现叔本华的唯一意志主义学说及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而这一思潮在尼采和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化理解中都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有趣的是,人们喜欢把单数形式的“线索”(clue)这个词所指称的对象作为比喻引入到哲学史研究中,热衷于谈论“哲学史发展的线索”。显然,这种谈论方式为一种抽象的、单线索性的哲学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史的发展都不是单线索的、简单化的,而是现实生活和各种思想酵素在复杂的互动中实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地志学”(topology)这个比喻,即不是把哲学史理解为一条或多条线索的交叉运动,而是理解为思想板块的运动。这个思想板块不仅和外在的其他思想板块处于相互作用中,而且其内部的各种思想酵素也处于相互作用中。我们认为,只有把这种新的哲学史观念引入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中,才能再现其真实性和复杂性。我们采取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出德国古典哲学得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我们不但考察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德国古典哲学核心理论形成的决定性影响,也考察了路德的宗教改革、牛顿的物理学和英国经验论、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传统、莱辛和赫尔德的启蒙思

潮、歌德和席勒的“狂飙突进”运动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二,充分论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不展开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具体论述,只限于论述其思想影响的普遍性和渗透性。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曾经指出:“歌德的全部诗作都充满了斯宾诺莎作品中那种鼓舞人心的精神。歌德终生效忠于斯宾诺莎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他在他的整个生涯里研究着斯宾诺莎,这是他在他的回忆录的卷首和最近出版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里,一直坦率地承认的。我记不清在哪里念到过这样一段话,对歌德这种始终不渝的斯宾诺莎研究,赫尔德曾经不快地喊道:‘如果歌德能拿起一本斯宾诺莎以外的拉丁文书籍,那该有多好!’然而,这不仅适用于歌德,后来或多或少作为诗人而知名的他的一些朋友,也都早已热衷于泛神论,泛神论在它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在我国获得统治地位以前,实际上早已盛行于德国艺术界了。”^{[1]317-318}这段话充分反映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对当时的德国艺术界的巨大影响。在海涅看来,这种影响不仅通过艺术界间接地波及到德国哲学界,而且实际上也直接地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家。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谈到谢林时曾经这样写道:“谢林先生借用斯宾诺莎的东西要比黑格尔借用谢林先生自己的东西来得多。一旦有人把斯宾诺莎从他那呆板的、古老的笛卡尔主义的数学公式中拯救出来,使得广大读者更能理解他,那么我们也许会发现,斯宾诺莎比任何人都更该控告别人偷窃了他的思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哲学家,往往自己并不自觉,却都是透过巴路赫·斯宾诺莎磨制的眼镜在观看世界。”^{[1]103-104}这段话不仅表明了斯宾诺莎思想对谢林的影响,也表明了它对当时所有德国哲学家的直接影响。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影响也可以从黑格尔下面这段话中体现出来:“斯宾诺莎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不是哲学。”^{[4]100}这就启示我们,撇开对斯宾诺莎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的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就会变得难以索解。

第三,认真对待德国浪漫派思潮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

初,在德国文学艺术领域里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曾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曾对德国浪漫派做了过于狭隘的阐释,即把它理解为“中世纪文艺的复活”^[6]。其实,浪漫派,尤其是德国的浪漫派,作为对思想领域中的启蒙思潮和文艺领域中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众所周知,施莱格尔兄弟是德国浪漫派理论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但创办了《雅典娜神殿》杂志,崇尚自然、提倡个性解放,主张文学艺术作品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而且译介莎士比亚及古代印度的文学作品,从而在德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德国浪漫派诗人蒂克、诺瓦利斯的作品也体现出与启蒙精神相抗衡的新的思想倾向。毋庸讳言,德国浪漫派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极大地拓宽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视野,影响了其发展方向。正如古留加所指出的:“在德国哲学返回自然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路标,那便是浪漫主义。”^[7]当然,问题也有另一个方面,即费希特,尤其是谢林的哲学思想也对浪漫派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用说,不对这种互动作用进行深入的探索,就无法展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丰富内涵。

第四,细致地解析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变数,即洪堡兄弟和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如果说,洪堡兄弟,尤其是威廉·洪堡重视对自然、科学、人、社会、国家和语言的探索,那么施莱尔马赫则倡导了一种以直观和情感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神学理论,并以实质性的方式推进了诠释学的发展。显而易见,这些思想酵素也与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形成了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道路。

显而易见,上述思想背景和酵素的引入,将促使人们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复杂性及其演化动力的多元性,也将促使他们从这些新引入的关系出发去超越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的、简单化的叙述形式,并为那些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找到明确的答案。

重估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问题

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人们在解答“究竟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时,总是习惯

于“两个归结”的思维方式,即把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归结为其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再进一步把黑格尔哲学的遗产归结为其辩证法。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被稀释化、贫乏化了。它给人们的印象是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留下其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诚然,我们也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但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思想遗产都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见解显然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力图纠正这个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错误观点。其实,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会发现,德国古典哲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实践理性(亦即意志)及“人是目的”的伦理观念;费希特的“行动哲学”及对知识基础的深入探究;谢林的自然哲学、艺术哲学及对人类自由本质的思索;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市民社会理论及异化学说等等。对所有这些思想遗产,我们都应该怀着海纳百川的心态,全面地、深入地加以发掘,从而重塑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形象,充分阐发它在西方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是十分丰富的,人、市民社会、实践、自在之物、历史意识和自由等要素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遗产。诚然,马克思也十分重视蕴含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但与马克思哲学的许多阐释者不同,马克思总是把辩证法融进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也就是说,马克思谈论的是历史辩证法,而不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纯粹辩证法;是人化自然辩证法,而不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自然辩证法。^[8]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传播的一个广有影响性的结论:“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是不确切的,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返回到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去。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就已阐明他的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乃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

的事件。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学说。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只适用于历史领域的某种实证性的理论,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完全可以涵盖对人类社会、自然界(或物质)和人的思维活动等一切现象的哲学解释。

总之,只有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认真研究和对其思想遗产的认真重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才可望得到恢复,而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解也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 (1) A·B·古留加. 德国古典哲学新论[M]. 沈真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93-294. 冯契等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分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与德国古典唯物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形成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过程,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形成了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理论。”参阅该书第 922 页。这一见解也可从《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得到印证。该辞典在第 22 页上这样解释“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条目:“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 从康德开始, 中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 到费尔巴哈告终。”汪子嵩先生等在《欧洲哲学史简编》中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 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参阅该书,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115 页。杨祖陶先生甚至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把德国古典哲学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第二个阶段则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参阅该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6 页。显然, 杨先生的观点来自于前苏联学者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参阅该书,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16. 这实际上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在其早期论文《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1844)中, 虽然恩格斯没有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 但在提到德国的哲学革命时说:“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 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联贯的, 合乎逻辑的, 必然的,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以致除了上面提到的体系而外, 其他任何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参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 1956: 588-589.
- (3) 张玉书编选. 海涅选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1. 据说, 奥·威·施莱格尔于 1812 年曾写信给斯太尔夫人说:“中世纪历史和古德文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参阅德·斯太尔夫人. 德国的文学与艺术[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90 页注①.

参考文献:

- [1] 张玉书编选. 海涅选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2] 列宁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 贺麟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5] A·B·古留加. 德国古典哲学新论[M]. 沈真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6] 俞吾金. 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扬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2).

(责任编辑 吴勇)



俞吾金的学术介绍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起担任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特聘教授，为国内哲学界第一位长江教授。

现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成员，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等职。出版个人学术著作《问题域的转换》、《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等20部。在教学和科研上获得10项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